

文艺人民性内涵的时代思考

○ 刘渠志, 赵 凯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文艺人民性的思想内涵不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史延伸,也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条红线。但是,文艺人民性的基本内涵与价值指向并非恒久不变的,随着历史的流变,必然呈现出鲜活的时代内容和特征。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以“人民主体”而区别于旧时所有的“人民性倾向”。在检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时,更应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下的市场法则与审美自律的平衡。

[关键词]人民性内涵;历史流变;大众文化;审美自律

一、文艺人民性内涵的历史流变

“人民性”是一个历史概念,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条红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内涵是人民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谈到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2]“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力的大众。”^[3]在马克思诸多的文艺批评中,都把文艺表现人民的历史地位、情感生活和理想目标,作为衡量文艺成败得失的尺度。当然,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关注的“人民”的范畴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

作者简介:刘渠志(1967—),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赵凯(1955—),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文艺批评。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标志性成果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其核心是“人民文艺观”,明确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中国新文化努力的方向。但对人民大众内涵的界定,在毛泽东的著述中是有历史发展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是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而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后,毛泽东又赋予“人民”以新的时代内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5]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仍然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邓小平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并要求社会主义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即要表现文艺人民性思想的新质与拓宽其精神内涵。习近平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由此文艺的人民性就不仅仅是文艺创作的倾向或理论命题,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与发展方向。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历时一百余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中国文学史百年间也是风云变幻。因此,关于文艺人民性的思考,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典判断上,停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某一个特定阶段的经验概括上,而必须赋予历史的考察与时代的检验。特别是对文艺的历史语境、“人民”范畴与属性的梳理、甄别及判断显得尤为重要。

“人民”一词在中国先秦典籍中就已经出现,如:《诗经·大雅·抑》:“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那时人民的概念主要是指从事生产的奴隶。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其基本体现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学说,则显示了人民的力量已经影响到了政治的发展。中国古典文学中,多有体现“人民性”倾向的优秀作品,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封建士大夫诗人放声为人民群众的疾苦而吟唱是难能可贵的。同情与怜悯下层民众的不幸与痛苦,是古典文学人民性内涵的重要特征。应该看到,古典文学中人民性思想倾向是多元而复杂的,通常的情况是,国破家亡时,士大夫文人沦为不幸,自然与下层民众思想感情贴近,从而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为民族的危难和大众的痛苦而抒怀。落魄之愁与怜悯之情形成此类作品的基本格调。

最早提出“人民性”概念的是别林斯基。“我们的人民性在于描绘俄国生活图画忠实性。”又说,“所有的人都在追逐人民性,可是只有那些不曾谋求钻营、只想呈现本来面目的人才获得了她。”^[6]其后杜勃罗留波夫对“人民性”的内涵作出了深刻的阐释。“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说等等,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7]文艺作品应该

描绘人民的生活、渗透人民的精神、感受人民的感情,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关于文艺人民性的阐释,应该说是那个时代文艺美学的精华。当然,作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他们的“人民性”意识,还不能够证明自己与人民大众感同身受。同情与贴近人民大众,在很大程度上还包含着他们寻求自我解脱甚至精神忏悔的成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70余年,虽然社会主义文艺的来源对象、表现对象与服务对象,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大众媒介的兴起,而发生根本的移位与裂变,其内在的精神联系与价值指向也没有发生质变与中断,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人民大众”的范畴必然增加了新的内涵,其结构组成已不可能是《讲话》中的“四种人”所能概括。在笔者看来,凡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界民众,都应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对文艺人民性内涵的界定也无疑要与当代社会市场化、信息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新的文艺生产、传播方式、新的文艺表现方式与新的受众群体、新的审美需求相联系。总之,坚守文艺的人民性,必须体现鲜活的时代内容和特征。

二、文艺人民性的价值重估与审美实践

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鲜明特征,首先在于把人民群众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理应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与其它一切有关人民性倾向的理论观点与文本表现的根本区别,就是努力实现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自觉”。^[8]总之,旧的封建主义或民主主义的“人民性”,是以同情与怜悯的人道主义倾向为特征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的坚实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性思想。

习近平同志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9]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不是一个“想象性称谓”或“空洞的能指”。“在特定的历史活动中,人民是由千千万万真实的个人组成的,诚然,‘人民’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能代表人民这一整体,但没有那些鲜活的个体,人民这个概念就无所依附。文学作品中的人民都是特定的‘这一个’……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对这些千差万别的人物群像的描写展示‘人民’内涵的丰富性。”^[10]对于当代文艺人民性向度与内涵的解读,应该包含着整体丰富性与个体生动性的有机融合,任何对于文艺人民性虚无主义的态度都是站不住脚的。纵观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众多为人们所欢迎的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深根于人民大众生活实践的土壤之中,都是人民大众情感心声的忠实表达者。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既充满着具体而生动的心路历程,表现出个性化的审美魅力,又折射出特定历史阶段

与生存环境中人民群众整体的生活境遇、奋斗历程与精神诉求。

鲁迅正是因为关注辛亥革命前后底层大众的人生命运,才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生动活泼的文学形象。鲁迅先生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的无穷魅力就在于它既是人民大众精神力量的充分体现者,同时又是感召与温暖大众人生的精神家园。鲁迅早年弃医从文“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终生以文艺的笔墨批判压迫人民的社会秩序,探寻人民群众的情感世界与理想追求。鲁迅对文艺的态度,已经摆脱了超越了旧时作家与那种简单的悲天悯人,而是与人民群众血脉相通。他写小说就是要用文学的灯火去照亮那些依然在黑暗中摸索的祥林嫂以及阿Q们的人生世界。鲁迅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后期那些深情表现人民大众的作品,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认同与践行。20世纪40年代,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影响下,解放区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农村,深入农民当中去,创造出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著名诗人李季称民歌是“文艺的宝库”,^[11]这是一位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诗人发出的感叹!他所创作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可以说是那个历史阶段践行文艺人民性向度的典范。诗人向民歌学习的过程既是广泛收集大众生活的素材,深入研究民歌的艺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创造性地运用传统的民歌形式,更是自觉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之中,同甘共苦,感同身受,从而使自己的诗歌成为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唤。

同样,在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历史征途中,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成为新时代精神的忠诚礼赞与艺术剪影。尽管由于机械反映论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文艺创作一度出现极端政治化与极端社会化的倾向,文艺的人民性向度也遭受歪曲而走向反面,但新中国的文学长廊中,仍然留下情系人民面向时代的精品佳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人民群众饱受沧桑的情感经历,在文艺审美创造中,演绎为波澜壮阔的社会人生画面;凝聚成撼人心魄的民族精神力量。新中国的几代读者,正是在《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创业史》和《雷锋之歌》等文学经典中获取珍贵的历史记忆,激活崇高与悲壮的英雄精神。令人难忘的是,在这些文学史诗中,我们几乎都能看到作家自己的身影。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莫言的《红高粱》系列、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则同为人民性新的文学书写作出成功的探索,文艺人民性内涵的丰富性与时代特征在这些优秀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

习近平同志说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12]柳青文学的魅力,就是讲老百姓的故事,为老百姓抒情,就是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精神,

着力发掘本乡本土的审美文化体验,从而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新的时代语境下中国普通农民的精神面貌与人生探求。柳青的创作态度,创作热情与创作境界为文艺人民性向度与内涵作出了最好的注脚。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首先文艺要自觉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员,这是新时代文艺人民性的特质。

三、文艺人民性的当代思辨与精神旨归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始终贯穿着这样的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人对自身生存方式与生存意义的不断自觉,对人生境遇意识的不断成熟和超越。深刻揭示社会历史转型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与实践过程,努力表现新的时代社会价值与道德体系重建的艰难与困惑,彰显与呼唤人类社会向上向善的正面精神价值,已成为当代众多文艺作品所要表现的“母题”,文艺的人民性也因此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应该看到,坚持文艺的人民性向度与“文学是人学”等以人为本的文学观,在价值取向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在克服与矫正过去在文艺与人民关系阐释上的简单化与片面化的基础上,文艺的人民性向度应具有更贴近文艺自律与审美本位的深刻内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实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文化生产正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重要一环,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中不可或缺一部分。电视、电影、出版、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体育比赛,及至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越来越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集团,甚至变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影响着国家和社会人文生态的健康发展。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和欣赏水准随着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的提升,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极大地促进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大众间的互动,使文学艺术从“象牙塔”重新走回到民间。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所以异军突起,正得力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文化转型;受众群体结构与受众商品意识的日趋完善,高科技催生的新的文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化艺术策划、制作与传播的深刻影响力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笔锋下的西方“大众文化”迥然不同,中国当代新媒体等条件催生下的“大众文化”从一开始就立足于面向、贴近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中央电视台已延续30余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经典文学作品的“图像移置”,还有日趋走向产业化的动漫艺术等等,虽然在文艺商品化的蜕变中还不尽成熟,还会当然的褒贬不一,众口难调,特别是商品化准则对某些作品审美属性的消解也令人担忧。但这些时尚而多样的文艺形式,却都因为传递了一个新的时代人民大众的情感诉求与文艺旨趣,而表现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这些都说明,文艺的人民性向度并没有因为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文艺形式的出现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与低估市场条件下“大众文化”形态对文艺人民性向度的挑战与影响。“大众文化”一方面满足了当代人民大众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为坚守文艺人民性向度提供了无限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其市场逐利

的商品属性又往往与文艺的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等倾向不谋而合,消解思想价值与精神引领,单纯追求产业商品趣味,还有平面复制、广告植入、“夸示性”消费等,这已使文艺的人民性向度的思想内涵与审美原则遭受干扰和扭曲。对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不能“失语”,要坚持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来检视与矫正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文学艺术的基本向度与趋势,使大众文化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化。要坚持文艺体现人民大众的生活经验与审美需求的价值导向,努力发挥文艺解放人的心灵自由,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审美功能。要引导和帮助艺术生产主体和大众接受群体树立新的时代精神与审美趣味,要从欲望与享乐的诱惑中突围,使文艺彰显出新的时代现实人生的诗情画意。

在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前提下,要在文艺产业化、商业化运行规则与文艺自身应有的人文内涵和审美规律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当代文艺作品既要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创造商品价值与资本积累,又要为新时代的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航向。努力协调当代文艺发展在审美与利益上的双重追求,一条最根本的途径便是解决好文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并真切呼应当代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与审美趣味。这是文艺人民性思想鲜活的时代内涵。譬如电视连续剧《渴望》《大宅门》《亮剑》,歌曲《常回家看看》以及冯小刚的贺岁片等,之所以受到大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自觉地将历史趋向与时代精神,艺术置换为活生生的生活场面与人物细节,以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的多元化艺术叙事(宏观的或微观的、历史的或日常的等),来演绎人民群众的人生历程与精神诉求,只有这样,当代文学艺术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812页。

[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4页。

[6]《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68-69页。

[7]《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184页。

[8]马建辉:《新世纪文艺人民性研究的三种倾向及其辨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6期,第40页。

[9][1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9、20页。

[10]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观》,《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第8页。

[11]李季:《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人民日报》1963年6月30日。

[责任编辑:李本红]